

doc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方志的学通论

李一氓



仓修良著

齐鲁书社

方志学通论

仓修良 著

齐 鲁 书 社

方志学通论

仓修良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1印张 3插页 461千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333-0176-5
K·24 定价: 10.50元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在州西二百一十里

在州西二百一十里

在州西二百一十里

在州西二百一十里

在州西二百一十里

在州西二百一十里

四所古城

古高倉城 周回二百八十步

在州西二百一十里

其城崩毀其地猶存

古勃城 周回五百步

在州西北十里

在州西北十里

在州西北十里

在州西北十里

在州西北十里

古高倉城 周回二百八十步

在州西北十里

在州西北十里

在州西北十里

在州西北十里

門陽關三百餘里伏流於下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漢也

伊州下三府之百四十 六千七百廿九 御七

在石門西國西戎之地周穆王征西戎昆吾敵

龜茲訛轉為伊吾郡漢書西域傳之國漢武征

錯在涼州之北伊吾之地又為匈奴所得漢武帝伐

匈奴其地其後漢帝至後漢永平十六北庭匈奴取伊

吾盧地伊吾木蘇尉西域傳通以據伊吾三失三得順

帝置伊吾可馬人魏晉無聞即與隋大業六年生擒

東買地置伊吾郡隋亂後漢末胡兵亂四下皆銅象

年車七城東降我唐檢置伊州實應中尚吐蕃等由

年張蘇漸收復國 沙州州戶居之羌龍雜處約千五

百人

伊州 管縣三 伊吾 納蘇 柔遠

伊吾縣 反在下 三府音 千五百七十六音至 伊四

在後漢伊吾去其城或言是實因所築也 縣以高城漢書

云伊吾盧漢杖萬里耳

寺三 觀二 樓二 塔二 佛二 像二 碑二 石二 經二 藏二 經二 塔二 佛二 像二 碑二 石二 經二 藏二

風俗有文字田夫為之入唯有事賦為繼冬夏常食

餅甚全數之具杯梳匙竹物皆不畜酒則茶酪而飲

古所謂誇博格飲則其質朴之像其俗不重衣冠唯

以多射為貴

陸地鹽池地周迴千里北去縣六十里中無水陸地也

滿味甘月麩即石積木林取竟無油楸

小伊吾城北去縣十里伊吾縣也百姓因此城側建先有田水

故其地是城故曰小伊吾

伊州山泉源泉水流為三泉泉名

為三泉縣東北水聖凡三水皆臨崖湧出南流入積石

故廟中有素書形像無數有石主君像像有古昌

亦在以前無他國朝至京即下衣神田以利刀割腹左右

邊邊出腹外數年其餘以殿祭其本手執刀兩頭高

下越轉旋國所集百事皆兩天心靈助無不效驗

唐沙州督都府圖經之二

吳郡志卷第二

吳郡范

成大撰

風俗

吳之士風晉俗隋志詳矣江南之俗火耕水耨
食魚與稻以漁獵為業雖無蓄積之資然而
亦無饑饉其俗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異居
大抵然也其大並習戰號為天下精兵俗以
五月五日為鬪力之戲各料疆弱相敵事類
講武宣城毗陵吳郡會稽餘杭東陽之

四明志目錄

六朝志目
各見本志首

卷第一

叙郡上

沿革表

沿革論

境土

分野

風俗

郡守

卷第二

叙郡中

社稷

城隍

宋范成大《吳郡志》

四明山志卷一
 地理志
 南上 聖孝 斷 訂
 地 所 全 兼
 男 百 家 全 兼
 名 勝
 四明山 高二百八十里 兩連 一 區 東 入 鄞 縣 南 接 天 台
 北 色 野 中 華 東 行 四 之 若 閉 以 通 日 月 之 光
 故 號 四 明 司 馬 萊 曰 第 九 明 山 故 曰 四 明 山 亦 曰 赤 水 天
 天 台 山 舊 居 五 縣 之 餘 地 名 曰 四 明 山 故 曰 四 明 山 亦 曰 赤 水 天
 天 台 山 舊 居 五 縣 之 餘 地 名 曰 四 明 山 故 曰 四 明 山 亦 曰 赤 水 天

清《台湾府志》《四明山志》

咸淳臨安志卷之十
 行在所錄
 學校
 清王宮大小學

臺灣府志卷一
 封域志
 星野 沿革 建置 疆界 形勢 山川
 通海
 古者茅土之錫星羅蕃布 疆界相錯 各有規方
 毋或越焉 厥後罷侯置守 建都立縣 卽黑水流
 沙靡題 暨商之方 亦不統於一 尊時勢然也 然
 幅員廣遠 必分封域 其間或仰觀 以辨疆畫 或

宋潜说友《咸淳臨安志》

题 辞

余始在弱龄，精治小学，好涉览乾嘉诸儒著述。稍长，读章实斋书，服其识议通达，足以矫当时学者溺于名物训诂之枉，自是卓然特立之士以补偏救弊自任者也。尝就其遗书各种，撮钞其精言要义而熟复之。自以为爱读章书者，莫我若矣。晚岁游历四方，与仓君修良邂逅桂林，其年方过四十，方任教于杭州大学。文质彬彬，蔼然可近。因与纵论学术，知其亦寝馈实斋之学，引为同好，相交益亲。后余数游杭州，得造其庐。观所纂述之文，充积几案。其于章实斋与《文史通义》，既有专著论列之矣。继是而治史学史，撰成《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以刊布于世。复从事方志学之研究，广搜博采，取精用弘，剖析源流，甄审得失，复为《方志学通论》数十万言。吁！何其多也，非兼人之力不及此！亦由君治学勤奋过人，故精进若是之速也。余以是益敬之重之。君所为《方志学通论》将出版，属余为序其书，余观其纲举目张，有条不紊，自来论方志者，皆不及此书之全备而精密。行见此书一出，沾溉无穷。今之新修地方志书者，又必人手一编，以此为津逮也。则君论述之功，岂可泯哉！余既服其难能，因书此以遗之，亦聊以志余赞叹之意云。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日 张舜徽

前 言

地方志是我国文化遗产中非常宝贵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据统计全国保存的各种方志有八千五百种左右，共十一万多卷，占我国现存古籍十分之一左右。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为我们研究祖国的各地历史、地理、物产资源、风土人情、自然灾害等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材料。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的传统，但是我们必须懂得，这种著作形式，与其它的文体一样，决不是成于一朝一夕，也不是成于某一人之手，而是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开始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完善，一出现便是一部完美的著作。它和谱学一样，都是史学的旁支，并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产生和形成，乃至最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方志学。因此，我们在研究方志的起源和发展时，必须把它放在史学发展的长河中进行探索，才能正确得出产生的原因，发现每个阶段不同的特点。关于这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提出，要把研究的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书中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

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512页)。然而目前研究方志起源的某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脱离社会发展条件，抛开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重要社会因素，孤立地仅就某部书来谈起源，其结果自然不可能讲清方志的起源。学术思想是各个时代政治、经济的反映，各种学术文化著作，总要为特定的时代服务，方志的编修自然也不例外，这就是方志发展过程中所以会出现明显的阶段性的原因。所以我们研究方志的起源和发展，必须密切联系当时社会的条件，否则是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方志学和其它学科一样，有它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因此，不仅要研究方志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而且要找出它产生的原因和发展规律，总结各个时期的特点和编纂方法，以作到推陈出新，为今天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服务。从方志的产生到方志学的建立，是经历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阶段还出现不同的名称，所记内容也是在不断变化、逐步丰富完善起来。这些变化显然都与当时的社会风气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既然学术思想是时代的反映，各种学术文化著作又都总要为特定的时代服务，因而也就必然要打上时代的烙印。所以我们研究方志发展史，必须密切联系有关社会条件，否则就讲不清各阶段的特点和名称、内容、体例的发展与变化，最多只能作些现象的罗列。

方志，顾名思义，它是以记载一方之事为内容的地方性著作，也就是前人所讲的“郡县之书”。由于它具有舆地著作一些特性，故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封建时代的目录学分类，都将它和一般舆地著作一样列在史部地理类。当时方志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样分法是可以理解的。而目前研究方志

的论著中，普遍存在着另一个倾向，即把历来公认的许多著名的舆地著作都纳入了方志的行列，如《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读史方舆纪要》等等，有的甚至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也都称为方志。这么一来，历史地理学就完全被方志学所取代了。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所以许多历史地理学家已经纷纷提出了批评。谭其骧先生1983年4月在洛阳召开的全国史志协会年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就已指出：“地方志不同于总志。地方志顾名思义是记载一个地方的事情的。地方志所记载的地方可大可小，大的一个省一种志，古代的大到一个州一种志，小的不管是一个县一个镇，也可以有县志有镇志。尽管可大可小，但总而言之是一个地方一种志。因为是记载一个地方的，所以地方志简称就叫‘方志’。

‘方’是对全国而言的，‘方’是总的对立体。凡是以全国为记载对象的，那就不能叫它地方志。清朝人编的《四库全书》，大家都知道，在地理类里头就有一部分叫总志之书，一部分叫方志之书，那就分得很清楚。凡是记载全国的，就在总志里头；记载一个地方的，就在方志里头。把各省的通志、府、州、县志叫做方志，这是很正确的，也是很科学的。可是这几年，我看到不少地方出版的地方志通讯一类刊物上所载的文章，往往把总志与方志混为一谈，这是很不应该的。我认为搞地方志工作的，有必要将这两个概念分清楚。《禹贡》是《尚书》的一篇，《汉书·地理志》是《汉书》的一篇，因为没有单独成书，所以《四库全书》里头当然没有把它列为地方总志；因为它不是一本书，但是它的性质无疑是总志。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它不列在《四库全书》总志里头而不把它当成一部总志。各地的地方志都不应该追溯到《禹贡》、《汉书·地理志》上去。

要把总志和方志分清楚。”（《中国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五期《地方志与总志及历代地方行政区划》）谭先生的讲话很中肯，应当引起方志学界足够的重视。

方志的性质是具有“亦地亦史”的地方性综合著作，记载内容的多样性，就决定了它的性质既不是史，也不是地，而是介乎史地之间的一种边缘学科。尽管它原是史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分支，经过长期的发展，它已另立门户，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只有充分认识这一特性，才能更好帮助我们在编修新志过程中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创新必须在总结旧志经验基础上进行，如果完全丢掉方志的特点而去创新，那编纂起来的也就不可能是方志。当然，社会主义时代编修的方志，必须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面貌，如果一切均依旧志体例篇目，内容很少有时代气息，自然也就谈不上创新。从方志发展的历史来看，每个时代的篇目、内容，总是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我们现在提倡要创立社会主义时代新的方志理论，编修新型的方志。但如果对旧志的发展演变和旧志的编纂理论一无所知，新方志理论从何而来？新方志又如何编修？没有继承是决无创新之理，这是经典作家早已指出的。相反，我们对旧方志理论和编纂方法的探索、研究，目的正在于批判地继承，吸取其有益的东西，为编修新志、创立社会主义新的方志理论服务。

方志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我从事于中国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方志既是史学的一个旁支，所以我对它要分点精力进行研究。六十年代，我曾写过二十余万字的初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部初稿连同有关资料和卡片全都丢失了，对我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损失。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通人和，百废俱

兴”，在党中央领导的直接关怀下，全国各地掀起了修志高潮。为了适应这一形势的要求，从1981年起，校、系有关领导要我给高年级学生开设“方志学”课，于是不得不重理旧业，从头做起。几年来又多次应许多省份和兄弟院校的邀请，为他们举办的方志讲习班、培训班讲课，所到之处，学员们都希望将讲稿印发。他（她）们的热切求知愿望，使我深受感动。就这样遂决心将自己对方志和方志学的看法、想法重新写成这部《方志学通论》。这样既解决教材之需要，又可供各地修志工作者参考。

要了解方志的发展演变过程和特点，是需要翻阅大量的各种类型的方志著作的。但是，要大多数人做到这点比较困难。因为有许多方志只有在全国比较大的少数图书馆方能看到，为了解决这一困难，我在书中尽可能多的抄录了有代表性的方志篇目。至于象敦煌发现的唐代图经，大家看到的机会就更少了。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唐代图经究竟是怎么样的东西，故将三部唐代图经残卷全文附上。

我是在吾师黎子耀教授引导下进入史学园地的，而对于方志学的探索，又是受黎师的启迪。他在六十年代初已经提出方志起源于两汉之地记，方志，是史学发展一个旁支，从那时起我就按此精神进行钻研。这次在重新撰写过程中，尽可能参考了所能见到的方志学界老一代的著作和新的研究成果，从中吸取营养，在此谨向先辈和同仁致以衷心感谢！当然，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对于具有争论性的问题，一般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限于学术水平和见闻，加之这又是一门新的学科，书中错误疏失，实所难免，衷心希望得到史学界特别是方志学界专家、方志编纂新秀和广大读者的指正。

书中所有表格除一幅由阙维民同志代为制作，其余皆为小女仓晓梅绘作或复制，她并参预了定稿后的誊写工作。一氓老人在百忙中为拙稿书写了题签，当代文献学家、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张舜徽教授撰写了题辞，还有许多师友为这部书稿的撰述提供宝贵的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此书能够顺利的出版，自然更要感谢齐鲁书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在目前学术著作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他们为我提供了出版条件，并为书稿提出了许多十分宝贵的意见，在此再次表示感谢！

仓修良

一九八六年春节于杭州大学

目 录

题辞	张舜徽
前言	1
第一章 方志的起源、性质和特点	1
第一节 方志的起源	1
一、关于方志起源的几种看法	1
1. 关于渊源《禹贡》说	2
2. 关于渊源《山海经》说	6
3. 关于渊源《周官》说	11
4. 关于渊源古代诸侯国史说	24
5. 方志多源论	26
二、方志应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31
1. 探索方志起源不能离开时代背景	31
2. 需要与可能	34
三、方志起源于两汉之地记	36
1. 历史观的变化促使人物传记的产生	36
2. 《史记》的诞生直接推动着人物传记的发展	40
3. 两汉魏晋的选举制度促使着人物传记的盛行	41
4. 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地方势力的强大是产生地记的社会基础 和政治条件	43

5. 地记是方志发展的早期形式	52
6. 《越绝书》不是地方志	61
第二节 方志的性质和特点	67
一、方志的性质	67
二、方志的特点	75
1. 突出的地方性	78
2. 编纂的连续性	81
3. 内容的广泛性	86
4. 记载的多样性	93
5. 鲜明的时代性	104
第二章 方志发展的三个阶段和四次高潮	115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的地记	115
一、魏晋南北朝地记发达的原因	115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地记概述	121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地记的内容	146
1. 表彰本地之人物	150
2. 记载地理之沿革	162
3. 描绘山水之秀丽	164
4. 叙述地名之由来	166
5. 介绍各地之水利交通	168
6. 反映各地之物产风俗	170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地记简评	172
1. 常璩和《华阳国志》	172
2. 习凿齿和《襄阳耆旧记》	188
3. 宋孝王和《关东风俗传》	196
第二节 隋唐的图经	199
一、隋唐图经发达的原因	200
1. 中央集权加强和地方世家大族势力的削弱	200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2. 东晋以来侨置州郡所造成的混乱是隋大修图经的重要因素	202
3. 修史制度与选举制度的变化对方志发展的影响	205
二、隋唐图经发展的概况	207
三、隋唐图经的内容	215
四、《沙州都督府图经》和《西州图经》	220
1. 《沙州都督府图经》	220
2. 《西州图经》	248
3. 关于《沙州地志》	253
第三节 体例趋于定型的宋代方志	259
一、记人述地再度汇合一体	260
1. 宋代学术空气的活跃对方志发展与体例的完善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60
2. 宋人研究当代史风气盛行直接推动记人述地再度汇合一体	262
3. 宋元方志作者已注意作志的目的性促使大量增加人文方面的内容	263
4. 许多学者参加方志的编修是促使方志逐步形成著述体裁的重要因素	266
二、宋代方志编修概述	267
1. 宋代方志编修十分普遍	267
2. 宋代统治者重视图经的编修	270
3. 方志的实用价值是方志得以迅速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	273
三、方志体例趋于定型	277
四、宋代方志述评	297
1. 范成大和《吴郡志》	299
2. 罗愿和《新安志》	300
3. 梁克家、陈傅良的《三山志》	303

4. 陈蕃卿和《嘉定赤城志》	307
5. 周应合和《景定建康志》	309
6. 高似孙与《剡录》	312
7. 周淙和《乾道临安志》	315
8. 陈仁玉和《淳祐临安志》	316
9. 潜说友和《咸淳临安志》	320
五、稳步发展的元代方志	327
1. 元代创修“一统志”	327
2. 元代方志编修概况	328
3. 元代方志述评	331
(1) 徐硕的《至元嘉禾志》	331
(2) 于钦的《齐乘》	332
(3) 袁桷和《延祐四明志》	334
4. 关于《重修琴川志》	337
5. 张铉的《金陵新志》	338
第四节 迅速发展中的明代方志	339
一、明代方志发展概况	339
二、明代方志编修的特点	345
1. 编修方志喜贯通古今、空发议论	345
2. 订立凡例以明著书之宗旨和原则	347
3. 注意研究方志的性质, 强调方志的作用	354
4. 关于方志编纂体裁的争论	358
三、明代方志述评	360
1. 康海和《武功县志》	360
2. 韩邦靖和《朝邑县志》	362
3. 王鏊和《姑苏志》	365
4. 董斯张和《吴兴备志》	366
第五节 进入全盛时期的清代方志	367

一、清代方志编修概况	368
二、方志编修的体例	375
三、清代修志中的流派	380
1. 考据派	381
2. 文献派	390
第六节 民国时期方志的编修与方志学的研究	397
一、民国时期方志编修概况	397
1. 黄炎培的《川沙县志》	400
2. 余绍宋的《龙游县志》	404
二、民国时期方志学研究概述	411
1. 梁启超的方志理论	411
2. 李泰棻的《方志学》	414
3. 王葆心的《方志学发微》	416
4. 黎锦熙的《方志今议》	418
5. 甘鹏云的《方志商》	419
第三章 章学诚和方志学	423
第一节 章学诚的方志理论	423
一、坎坷的一生	423
二、丰富的方志理论	432
1. 确立方志的性质和作用	433
2. 主张方志分立三书	440
3. “志”书的体裁和内容	447
4. 辨清各类方志记载范围和界限	460
5. 建议州县设立志科	463
6. 章学诚方志理论的局限性	466
第二节 章学诚方志理论的三大来源	469
一、史学理论是他建立方志学的重要源泉	469
二、修志的实践经验不断丰富他的方志理论	478

三、总结吸取前人修志经验和教训	493
第四章 旧方志的价值和整理	501
第一节 旧方志的价值	501
一、研究民俗学的源泉	502
二、研究历史地理不可缺少的资料	504
三、研究明清以来社会经济的重要史料宝库	508
四、研究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资料	511
五、为研究各个地区自然灾害提供丰富的资料	515
六、研究各地教育史的重要园地	521
第二节 旧方志的整理	525
一、利用方志的资源著作成书	525
二、辑佚已经失传的旧志	530
三、考录与索引	537
四、分类资料的汇编	548
五、影印点校出版旧志	551
第五章 新方志的编纂	553
第一节 建立修志领导机构	553
一、要有一个精干的领导班子	553
二、组织培养一批强有力的专业队伍	554
第二节 资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	555
一、广泛搜集资料	555
1. 前人的著作	555
2. 各类档案资料	558
3. 实地考察, 搜集第一手资料	559
二、精心整理	562
三、慎重考订真伪、鉴别正误	564
1. 辨伪	564
2. 正误	569

(1) 理证法.....	569
(2) 书证法.....	574
(3) 物证法.....	582
四、如何选择和运用史料	584
第三节 对新志编修的几点意见.....	586
一、从实际出发拟定好篇目与编写大纲	586
二、要注意做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591
三、应当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596
四、充分发扬据事直书的优良传统	600
五、新编方志必须反映新时代特点、体现新时代社会面貌	609
六、撰写人物传的几个问题	612
1. 上传的标准	612
2. 生人不宜立传	614
3. 人物传应突出人物贡献写出人物个性	618
4. 人物传的撰写不要轻易乱下结论	623
5. 吸取前人写好列传的良好方法	626
七、关于专业志撰写的几点意见	631
1. 坚持以类相从, 按类撰写	631
2. 专业志要专	632
3. 专业志要做到突出重点反映特色	633
八、山志编修的四点意见	637
1. 山志的篇目设置问题	637
2. 应对本山作实事求是的估价	641
3. 应当突出名山的特点	644
4. 对历史上所形成的名称不要作轻易的改动	646
九、方志文体要做到叙而不论	649
附记	650

第一章 方志的起源、 性质和特点

第一节 方志的起源

一、关于方志起源的几种看法

方志的名称，顾名思义，是一方之志书，它是以记载一方之事为内容的一种著作，因此全称应为地方志书。唐代杰出史学评论家刘知几称它为“郡书”，并在史学著作分类上把它列入“杂述”类；《隋书·经籍志》的作者称之为“郡国之书”，这是很有道理的。关于这点，我们下面再作详细论述。这种著作的内容，开始比较简略，所分门类亦不过地图、山川、风土、物产、人物数种而已。到了宋代，不仅体例日趋完备，而且内容也不断增加，可以说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其内容是逐渐丰富。举凡一地的建置、舆图、疆域、山川、名胜、物产、赋役、风俗、职官、人物、金石、艺文、学校、灾异等情况，均有记载。所以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称它为“博物之书”。

地方志书的编修，在我国已经具有悠久的历史，并成为我国民族文化发展中一个优良的传统。这种带有地方行政区域特色的地方性著作，究竟起源于何时，直到今天，仍是众说纷

纭。有的主张渊源于《禹贡》；有的坚持导源于《山海经》，有的认为出自《周官》；有的则说溯源于古代诸侯国史。除此以外，更有人提出“多源”之说。对于这些说法，笔者都不敢苟同。因为不仅论据不能令人信服，而且撇开社会条件，单从某一部书来探索一种著作的起源，这种研究方法本来就欠妥当，自然就很难得出令人首肯的科学结论。

1. 关于溯源《禹贡》说

《禹贡》是我国古代历史文献《尚书》中的一篇，《尚书》的性质，是古代的史料汇编，也可以说是档案汇编，因为里面所收均为古代帝王重要政治文件。据古代史籍记载为孔子所删订，在流传过程中，已经过后人篡改和补充。经过学者们的研究考订，认为许多篇章都是出自孔子以后人之手，而《禹贡》一篇，学术界已公认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在1982年历史地理学年会上所作的《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报告中再次严肃指出：“近几年各地都在修地方志，不少省区都办了地方史志通讯这一类刊物，我偶然翻翻，发现许多人讲到政区沿革时往往闹笑话，例如，《禹贡》不是大禹时代的作品，《禹贡》里的‘九州’不是夏代的行政区划，而是战国时代学者对他们所知道的整个‘天下’所作的地理区划，这是稍稍接受过一点五四以后的历史教育，破除了对儒家经典的迷信的人所共知的常识，可是现在的地方史志工作者竟然还有人在沿袭封建时代的老一套，讲到一地的沿革，还是从夏禹时属某州讲起。”（载《学术月刊》1982年第十一期）这里批评的虽指某些地方修志中所出现的现象，其精神实具有普遍意义，要大家在研究中对

待文献资料必须持审慎的科学态度，“不要轻信前人对古代文献资料所作的解释”。事实上在方志理论研究中确实也曾出现过这种现象，抓住前人三言两语，便以己意而加以发挥。如有的方志论著，将《禹贡》的九州，说成是“全国的行政区划”。为了说明《禹贡》对后世方志编修的影响，甚至还说：“从体例考察，后世纂修的许多方志，特别是全国性的区域志，不少昉自《禹贡》。例如，唐李吉甫纂《元和郡县图志》，就是依《禹贡》别九州之例，将天下分为……十道来进行载述的。又如宋王存纂《元丰九域志》，也依《禹贡》别九州之例，按宋制将天下分为……诸路等，而确立其全书结构。这都说明后世方志在体例方面同《禹贡》存在着源流关系。”（见《方志渊源考辨》，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三辑）关于“全国的行政区划”说之不妥，谭先生讲话已经指出，无需多说。至于《元和郡县图志》和《元丰九域志》也决不是“依《禹贡》别九州之例”。因为“道”和“路”并非两书作者所自定，而是唐宋政府所划。这在历史上都有明确记载。而两书的体例，近代历史地理研究工作者似乎亦无人说它们是溯源于《禹贡》。我们就以《元和郡县图志》来说吧，王文楚、邹逸麟所撰《我国现存最早一部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一文中曾明确指出：“《元和志》的体例，追溯其渊源，大体上是承受了两方面的原委：一是《汉书·地理志》以来各正史地理志和六朝以后地理总志的影响。这两种都可称为疆域地理志的体制，是以一朝某一时期的疆域为范围，以州郡为纲，以县为目，分别记述其建置沿革，然后在各郡县下附系户口、山川、城邑、关塞、亭障、祠庙、古迹、物产等。《元和志》继承了这种体制，并有所扩充。……二是汉魏以来图记与图经的影响。”

（载《历史地理》创刊号）文中从未提到《禹贡》的影响。李志庭同志在《李吉甫与〈元和郡县志〉》一文中亦说：“李吉甫对于舆地学界最大的影响，还在于他在《元和郡县志》里创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地理总志的体例。……这种体例，正如王文楚、邹逸麟同志在《我国现存最早一部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一文中所说，大体是继承了汉魏以来疆域地理志和图记、图经两方面的体制，并加以发展而成的。”该文不仅讲了承受，而且讲了它的影响。说“这种体例，既突出了疆域政区的主体，又可使政治、经济、自然等地理要素汇于一体，而且按图识志，使人一目了然，确实是比较完善的地理总志体例。所以多为后起学者所师范。《两唐志》、《宋志》中的‘贡赋’一项，就是效法《元和郡县志》的。后起的地理总志亦多有继承。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以府州为纲，以县为目，下列建置沿革、府境、四至八到、主客户、土产、山川、古迹等项，都和《元和郡县志》一致。此外，它又增加了风俗、姓氏、人物等项，这些也多为后来总志所吸收，所以《太平寰宇记》在地理总志的发展史上有着继往开来的作用。不过，乐史删去《元和郡县志》中‘贡赋’和地图等项目，却为后人所不取。后于乐史的王存，他编修《元丰九域志》，不但重新开列‘土贡’一项，而且也有过附图的打算，所以原本称此《志》为《图》，后因图无绘，‘乃清改曰志’。作者还引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该书的评述，说‘舆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并将它‘录以冠地理总志之首’，称其为‘诸家祖述之所自’。”（《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二期）我们所以不厌其烦地大段摘引这些论述，目的

在于说明这些重要的全国地理总志著作，并不象有的人所说“是昉自《禹贡》的”，“是依《禹贡》别九州之例”而作的。这几位同志都是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所述应属可信，但他们文章中论述这些著作渊源时，竟只字未提《禹贡》，难道是出于偶然吗？

当然，《禹贡》作为我国最早的一篇地理文献，所述内容确是相当丰富的，它把全国区分为九州，而对于山脉、河流、土壤、物产、贡赋、交通等多有叙述，古人言地理者确实有人将它视为源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隋书·经籍志·地理类序》中说：“《书》录禹别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条其物产，辨其贡赋，斯之谓也。”这里所讲其实就是指《禹贡》所载内容。序中还说：“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这是从该书所记内容与《禹贡》大体相似，故说是“依《禹贡》”而作。元代张铉所纂《至正金陵新志》的《修志本末》也述及《禹贡》，并为许多论述方志起源者所引用。其实我们只要看了原文，就会发现作者不仅是出于泛泛而论，而且是概念含糊不清，竟将《禹贡》与诸侯国史相提并论。如曰：“古者九州有志尚矣，《书》存《禹贡》，周纪职方，春秋诸侯有国史，汉以来郡国有图志。”一般论著，大多引到此为止，从而引伸古人论述方志之起源首列《禹贡》。“九州有志尚矣”，有何依据？《禹贡》既然是别九州以叙九州之事，如何又与割据一方之诸侯国史相比附？诸侯国史是什么，《修志本末》中也已讲了，“晋之《乘》，楚之《梲杌》，鲁之《春秋》，皆诸侯史也。《乘》、《梲杌》缺亡，不可复知，以《春秋》经传考之，诸所记载，或承赴告，或述见闻，其事有关天下之故者，虽与鲁无预，皆书于册，其非义之所

存，及闻见所不逮者，虽本国事，亦或弃而不录，疑此皆非圣人新意。史策旧章，固存斯义，修《景定志》者，用《春秋》《史记》法，述世年二表，经以帝代，纬以时地人事，开卷瞭然，与《建康实录》相为表里，可谓良史。而戚氏讥其年世陡繁，封画鲜述，所作续志，悉芟去之，以论他郡邑可也，而非所以言建康，岂惟前代事蹟漫无统纪，亦将使昭代之典，闕而不彰，今不敢从，悉依前例。”综上所述，可见作者对于诸侯国史记载的内容是十分清楚，而方志所应具有的内容也叙述得十分明白。方志编修，既用《春秋》、《史记》之法，无疑已是地方史了，这与《禹贡》有何关系？所以我认为这里虽列了《禹贡》，毫无实际意义，完全出于信口而谈，而我们今天却摘引作为方志渊源于《禹贡》的论据实在缺乏认真分析。至于其他所引，这里就不一一列举。总之，对于前人论述，必须进行分析，近情可信者用之，言之成理者信之。若是七拼八凑，信口而论，如上所引，摘引再多，也不能令人信服。

2. 关于溯源《山海经》说

《山海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至今尚无定论。多数认为，从其内容来看，应是我国古代一部地理著作。现在共存十八篇，简而言之，分《山经》和《海经》两大类。经多数学者研究，其书既不是出于一人之手，也不是出于一时之作。最早编写时间是在战国，流传当中，不断为后人所增删和篡改，所以全书是经过逐渐附益而成。由于它最大特点是采用神话的形式，因而常被看成是荒唐不经的著作。书中记述了将近一百个神话故事，是我国古籍中保存神话最多的一部作品。它以神话的形式，既记录了全国的

山水矿藏，又记载了二百六十多种动物、一百三十多种植物。而所记山水并不虚构，后魏酈道元的《水经注》，是众所周知有相当科学价值的地理书，其中引用《山海经》的材料有八十多条，并经过酈道元的考实。清代毕沅（1730—1797）在其所注的《山海经》序里也说，书中山水，多数都能考知。谭其骧先生在《〈山经〉河水下流及其支流考》一文中说：“实际上《山海经》中《山经》部分包含着很丰富的有关黄河下游河道的具体资料，……我们如把《北山经》中注入河水下游的支流，一条一条摸清楚，加以排比。再以《汉书·地理志》、《水经》和《水经注》时代的河水道予以印证，就可以相当具体地把这条见于记载的最古的黄河故道在地图上显示出来。”

（《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另外，经过长期的研究证实，它还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矿藏地质文献，所记二百二十六处金、银、铜、铁、锡等矿藏，现在大都可以证实。关于这部书的价值，袁珂在《〈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一文中作了很好的概括，文章开头就说：“在先秦古籍当中，《山海经》是一部具有丰富内容和独特风貌的书。全书虽然仅仅三万一千多字，却包括了我国古代神话、历史、地理、物产、医药、宗教……各方面的许多宝贵材料，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和古代神话的极重要的文献。这些材料，大体上还保存着传说中古代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本来面貌，并没有经过多少涂饰和修改，尤其使我们感到可贵。”（《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根据上述所引，都说明《山海经》这部古籍，内容丰富而风貌独特，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决不是一部荒唐不经之书。当然目前学术界看法也并未取得一致，如袁行霈先生《〈山海经〉初探》便是代表了另一种看法。文章提出“《山海经》是一部什么书”？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目前大多数论者都认为《山海经》是古代的一部可信的地理著作。”文章列举了自《汉书》以来历代对此书评论以后，于是概括性指出：“上述形法、地理、语怪、小说等说，各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免有片面性。还是鲁迅先生说得确切：‘《山海经》今所传本十八卷，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以为禹益作者固非，而谓因《楚辞》而造者亦未是；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人亦有增益。’这是十分精辟的见解，可惜他没有详加论述。现仅就我个人接触到的一点有限材料，将这个问题展开论证一下。”文章在反复辨证以后说：“总之，我认为《山经》是战国初、中期巫祝之流根据远古以来的传说，记录的一部巫覡之书，是他们行施巫术的参考。《海经》是秦汉间的方士书。《汉书·艺文志》将《山海经》与五行、蓍龟、杂占等书一起列入数术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它与度测地势建立城郭的形法书毕竟不同。《山海经》固然详述山川、异域，但多系传闻之辞，很难考实，而且并非以讲述地理为目的，不可视为实用的地理著作。《山海经》与小说虽有因缘，对后世志怪小说影响很大，但它本身究竟不能算是小说作品。”（《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三辑）对这样一部书为什么在看法上会产生这样大的分歧呢？关键在于它所记的内容、形式、体例都与众不同，过于奇特。象这样一部书，直到现在，竟还有人硬把它与方志挂起勾来，说是方志起源的一个源头。事实上只要大家将此书与方志冷静作一比较，就可以发现无论形式、体例、结构全无共同之处。而持此论者的理由则是“从后世方志的某些内容来考察，也或多或少可以看出《山海经》中的某些记述是其渊源所在。”“辛氏《三秦记》所述确多‘乡国灵怪’。此正与《山海经》

中的某些记述略同。又《禹贡》记物产而不及风俗，职方载地理而不及人物，然《山海经》所述，既有风土、人情，又涉人物、世系。这些不仅已补《禹贡》与《周官》之无，而且正同后世方志风俗、人物门类吻合。此外，后世方志多有祠庙、碑碣、仙事、异闻等记录，考之《山海经》，亦有祭祀、巫医、神祇、怪异等载述。由此亦可见方志某些内容有来源于《山海经》之痕迹。所以，若谓《山海经》亦是后世方志源头之一，确无不可。”（《方志渊源考辨》）我们认为，这种简单附会式的论证是不可取的，不能单纯以该书中有某些内容，就以后来之方志对号入座，这如何能令人信服？若是此论成立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可以这样讲，古代所有典籍，都有后来方志的影子，都对后来方志从不同角度有着影响，这是毫不夸张的。远的我们姑且不讲，就以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而言，恐怕影响更为直接。此书既述人物，又载山泽，既记载祀典，又遍录怪神，特别是所叙风俗，形象而生动，对研究汉代的社会风气，自然很有价值。如卷八《祀典》小序曰：“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时盛矣。至平帝时，天地六宗已下及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营寓夷泯，宰器缺亡。盖物盛则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故记叙神物曰祀典也。”单是这几句话，就告诉了人们关于汉代事鬼敬神的状况。而内容则大多反映出汉代的一些风俗习惯。书中有一条记汉代妇女装束的材料，描写很细致，对了解汉代妇女的打扮提供了具体的形象。“桓帝元嘉中，京师妇女作愁眉啼粧，坠马髻，折腰步，龋齿笑。愁眉者，细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处。堕马髻者，侧在一边。折腰步者，足不任体。龋齿笑者，若齿痛不忻忻。始自冀家所为，京师翕然皆放效者。”